跨学科长文日报

四篇值得读完的长文

2026-11-06

中文源 9 · 英文源 13 · 全量扫描 — 条

每篇均为通读全文后所写，非摘要拼接

本刊收录杂志与智库的深度长文，非同行评议论文

本期四篇：量子基础、科研制度、神经多样性与文化产业劳动。扫描现有中文9源、英文13源，共425条新条目，按正文长度得到91条候选；排除近日已推荐、清单、评论影视书籍及纯新闻快讯后，保留以下四篇。文章日期按原网站标示，不把转载时间当作研究发表时间。本期均为媒体长文，非同行评议论文。

1. 波函数只是知识，还是世界本身的一部分?

作者：Charlie Wood｜来源：Quanta Magazine｜日期：2026-11-06 ｜ 原文

文章以爱因斯坦、贝尔与二〇一二年的PBR定理串起量子基础争论，核心不是“世界是否存在”，而是量子态究竟描述客观物理状态，还是只描述观察者的不完全知识。爱因斯坦相信，测量前粒子已有确定属性；波函数好比天气预报，概率变化主要表示我们知道得更多，而不是外部世界突然改变。贝尔定理与此后的实验则说明，满足相关前提的局域隐变量模型，无法重现量子理论预言的全部关联，因此这幅直觉图景必须修改。

但否定局域性，还没有单独排除“波函数只是知识”的路线。文章介绍斯佩肯斯的玩具模型：对真实状态的知识施加限制，也能模拟量子不可克隆、隐形传态等若干现象。PBR进一步追问，不同量子态能否像两种信息描述那样，对应部分相同的底层真实状态。作者用两副可能抽出相同红色王牌的牌堆作比喻：若状态存在这种重叠，仅看抽出的牌，就不总能确定其来源，也不能保证每次排除一种来源组合。

量子联合测量却能实现经典重叠模型无法保证的排除任务。在独立制备系统的底层状态相互独立等假设下，PBR由此排除一类重叠的认识论模型。文章也报道了利用量子计算机实现相关任务的实验：这既检验量子预测，也可成为检查设备是否表现出量子特征的工具。重点是推理的前提与结论，而不是把一个哲学口号当作实验读数。

标题中的“杀死现实”明显比严谨结论更强。定理没有证明意识创造宇宙，也没有唯一选定玻姆理论、哥本哈根解释或量子贝叶斯主义；对制备独立性、底层状态如何定义的讨论仍然重要。作者采访的研究者对本体论也并不一致。这是一篇科学报道，不是新发表的定理论文；它的价值在于帮助读者分清，哪些直觉已受到数学与实验的约束，哪些仍属于解释选择。读完后更合理的问题是“为了保留某种现实观，必须放弃哪些假设”，而非“月亮是不是不存在”。

2. 被当作“噪声”的星际尘埃，为什么值得单独研究?

作者：Dylan Jow｜来源：Aeon｜日期：2026-11-06 ｜ 原文

天文学里的“干扰”并非天然无价值：寻找宇宙微波背景信号时，尘埃辐射是需要扣除的前景；用脉冲星寻找引力波时，星际电离气体会扰乱信号；通过弱引力透镜推断暗物质时，普通物质复杂的运动又成了麻烦。然而尘埃参与恒星、行星乃至复杂分子的形成，气体本身也记录银河系的结构。作者借此提出一个科研制度问题：谁决定哪些现象是目的，哪些只能作为通往“大问题”的障碍?

他的解释兼具历史与组织视角。二十世纪的粒子物理、宇宙学和冷战科研投入，提高了基础物理的文化地位；大型加速器受挫后，宇宙又成为探索高能过程的天然实验室。今天的昂贵观测设施需要共同优先级，暗物质、暗能量、早期宇宙等议题因此更容易获得资源。申请职位、望远镜时间和顶级期刊时，研究者即

使真正关心尘埃，也往往必须把工作包装成解决基础物理难题的一步。这种反复表述，会制造比个人真实兴趣更整齐的“全领域共识”。

作者还把批评延伸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。处理观测的管道并不中立：某些复杂现象一开始就被压缩成需要边缘化的干扰参数。用模拟图像训练模型，则会继承模拟所采用的简化假设；模型能够识别统计模式，不代表已经理解生成这些模式的物理机制。因而，预测准确、消除相关性与解释过程，是三件不同的事。若任务只是提取背景宇宙学信号，这些工具可能十分有效；若目标是理解气体与星系本身，评价标准就不能照搬。

这是一篇天体物理研究者的观点长文，而非对科研经费分配效果的因果研究。作者以自身求学、申请和听报告的经历举证，没有证明研究“大问题”普遍低效，也承认大型合作必须设定优先级。他真正反对的是把某种历史形成的学科等级当成自然真理。文章最有启发性的跨学科含义是：任何评价体系都在塑造可见问题。把异常、地方性和复杂性全部当作噪声，可能提高既定任务的效率，却也可能消灭发现新问题的入口。选择研究目的，本身就是科学判断的一部分。

3. 同时渴望秩序与新鲜感：理解孤独症与ADHD共存

作者：Sarah Hendrickx | 来源：Aeon | 日期：2026-11-05 | 原文

一个人可能清晨兴奋地规划移居、报课与新事业，认真制作比较表，却很快发现自己既承受不了变动，也无法维持兴趣。作者以亲身经历说明，逻辑严密、偏爱规律和冲动求新，并不一定互相排斥。所谓AuDHD，是孤独症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同诊断的非正式简称，而非文中另行验证的一种独立疾病。过去的诊断规则曾把两者排斥在外，直到二〇一三年相关限制取消，更多长期无法被单一标签解释的成人经历才进入临床视野。

文章重要的转折是区分“没有被看见”与“以前不存在”。诊断范围和成人标准的变化，会改变被识别的人群，不能把诊断增加直接解释为新出现的流行病。作者指出，两类特征可能互相遮蔽：有人太善于规划而不认为自己可能有ADHD，也有人社交积极而排除孤独症。她减少旅行和高压工作后，焦虑与耗竭有所缓解，却又因缺乏刺激感到空洞，最终发现稳定与新鲜感需要同时被照顾，而不是二选一。

研究层面，文章援引共现、家族和双生子研究，提示两者可能具有部分共同遗传基础，但没有给出一个可普遍套用的患病率。一项纳入二十三项研究的综述，对特定孤独症青少年群体中ADHD症状比例的估计跨度极大；这种差异说明样本、测量与诊断口径非常重要。现有研究也较集中于儿童和青少年，不能直接代表所有成人。至于二者是相对独立的特征叠加，还是存在特殊的组合表现，学界仍有不同看法。

作者结合为新书收集的六十九名成人及家长的叙述，描述秩序与冲动、独处与社交、专注与切换之间的拉扯。她也强调创造力、细节感受和兴趣带来的喜悦，反对研究只统计缺陷。这是结合个人经验、访谈与文献的心理议题长文，不是具有代表性抽样的临床试验，受访者的积极体验也不能证明双重诊断必然带来优势。最值得带走的不是自我贴标签，而是认识到相似的外在行为可能来自不同甚至冲突的需求；理解个人具体处境，比从刻板印象推断人格更可靠。是否符合诊断仍需专业评估，不能凭开篇场景判断。

4. 从明星合同看劳动控制：K-pop为何让成功者也难以退出?

作者：Sarah Hurtes、Jin Yu Young｜来源：纽约时报中文网｜日期：2026-11-06 ｜ 原文

这篇报道把NewJeans与公司的争端，从娱乐新闻还原为契约与议价权问题。记者获得成员未成年时签署的合同，并请五名专家审阅，发现文本删去了韩国政府范本中有关教育、身心健康等保护性表述，还限制批评公司、“态度不真诚”和“不适当的恋爱关系”。关键不只是条款严厉，而是这些模糊规定把解释权交给公司：艺人的公开表达、生活方式与职业行动，都可能被转化成违约风险。

报道给出的机制，是训练投资与组织控制的捆绑。公司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培养艺人，同时承担唱片、经纪和代理等角色；成员尚未成名前，个人替代选择有限。文章援引一名家长要求修改合同后收到的邮件，说明形式上可以拒签，不等于实际拥有充分谈判能力。公司则回应合同合法、经家长同意，政府范本不具约束力，条款用于保护投资与艺人。报道也保留了对训练条件的指控及公司的否认，不能把全部争议描述为已经司法确认的事实。

财务细节尤其值得留意。文章没有把整个行业的练习生债务一概套到NewJeans身上，而是明确指出，公司承担了该组合早期费用，成员出道后即可获得收入。这意味着控制关系并不只靠负债维持，还可以通过退出赔偿、收益分配及职业渠道形成。报道提及一名成员面临约两千二百万美元索赔，但这是公司的诉讼请求，不是法院已经判定的赔偿额。合同以有收入月份计算平均收入，是否抬高赔偿，专家与公司也有不同解释。

另一个跨越劳动法与技术伦理的问题，是合约结束后谁控制人的数字形象。按报道，合同允许公司继续使用成员姓名、肖像与声音，包括人工智能声音克隆等用途，并在继续销售旧音乐时降低相关分成。保留获得报酬的权利，不等于保留决定用途的权利；但这些条款最终能获得多少司法支持，文章明确表示尚不确定。这是依据文件、采访和专家解读的调查报道，并非产业整体的统计研究，也不是对某一方全面定责。它揭示的普遍问题是：当投资者同时控制培养、分发与退出渠道时，即使劳动者已极其成功，收入与名气也未必能转化为自由退出和自主决定的能力。